

唐振常 ● 主 编
沈恒春 ● 副主编

History of Shanghai

上海史

CHIEF EDITOR: TANGZHEN—CHANG
DEPUTY CHIEF EDITOR: SHENHENG—CHUN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上海史

主 编 唐振常

副主编 沈恒春

主要撰稿人

譙枢铭 卢汉超 熊月之 陈正书

郑祖安 李天纲 吴德铎 沈恒春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邹纪华

上海史

主编 唐振常
副主编 沈恒春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84号)

发行所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34.5 插页 9 字数 855,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8-00494-3/K·122

定价20.55元

序

唐振常

上海，在历史上曾经蒙受帝国主义列强所强加于它的屈辱。租界延续了近百年的生命。一百年中，在所谓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中国政府丧失了主权，洋人统治着这里的一切，人们称之“国中之国”。租界之不同于殖民地，只不过这块土地还属于中国。

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所称的冒险家，按其原意，是指从国外来的身无长物的各种到上海发横财的人。他们投机冒险，可以忽成巨富。

上海，又习惯于被叫做十里洋场。在洋场里，纸醉金迷，穷奢极欲，中外巨富挥金如土，一夜所费，足够民间度数十百年之资。

上海，又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改革、斗争最光彩夺目的舞台。晚清同光改革——世所习称的洋务运动，在上海最著成效；维新运动的启蒙功效，于上海而大著；排满反清的资产阶级革命，上海是国内的中心；尔后以从伦理文化上作探讨为依归的新文化运动，发端于上海；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于上海者达十年。

上海，屈辱的城市，光荣的城市。

中西文化的撞击与冲突，是横贯中国近代史的不容忽视的重要背景。两相比较量，民族文化危机四伏，立脚不住。向西方学习，成为一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向往。学习什么？尽管较长时期是模糊

而朦胧的，终究逐渐在向前进。上海，通过租界，作了西方文化的实地展览场所。从道路设施、市政管理、文明卫生，以至文化现象、政治制度，眼所见，目所及，为华界的城厢与闸北起了楷模作用，并立即起而仿效。以至于孙中山屡称租界为市政模范。

上海以其地理上的优越位置，明清两代经济发达，形成世所习称的“江海通津，东南都会”。1843年开埠不久，即取代了广州的地位。上海，既是输入西方文化的窗口，又逐渐成为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上海成为中国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重要城市，其影响与作用及于全国，至于世界。

多年以来，有志之士，追求中国的近代化。无疑，上海在全国的近代化程度最高。这所谓近代化，自然是指资本主义化。而上海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地位，不容否认，也不能否认，租界这个怪胎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之后，上海的地位起了变化。文化中心北移，这还可以说是势所必然。经济上的优势，逐渐削弱，从对国内来说，已经值得探讨；在国际上，则从昔日之有所影响于世界，变成了无足轻重，当年被称为“小上海”的香港，把上海远远抛在后面了。主观上，这只能归因于我们闭关锁国国策之使然。至于交通、市政、住房、卫生等等问题之日趋严重，更是人所共见。一句话，上海的老本吃不下去了。改革开放十年以来，这些问题，日渐引起上海以至全国的关心和议论。有人这么说，上海当年开埠之后取广州而代之，照此下去，也许广州不久就要向上海讨回它失去的地位了。这种说法，对于上海人而言，并非纯属杞忧。有识之士，提出了重振上海雄风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然何以振之，时不我待，出内入外，应该有所论定了。

正因为上海昔日有其雄风，加上它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近世以来，致力于上海的研究者颇有人在。可是，除了论文，就专史言，

则只有英国人写的上海史，法国人写的上海史，日本人写的上海史。不能说外人写上海史就一定是隔靴搔痒，但是，要其大指，则实或为公共租界史，或为法租界史，或侧重于地理历史，或只及于社会现象，而无完整的上海史，无中国人自己所写的上海史。（蒯世勋《公共租界史稿》也只是公共租界史）至华东师大刘惠吾《上海近代史》出，稍纠其偏。近代上海诚然是最丰富的历史现象的集中，但是，不上溯古代上海，亦不足以了解近代上海。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上海通史，由古及今，止于1949年。期望能够历史地看上海，了解上海。对于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缺而不述。对于大家所关心的上海地位之何以衰落，如何重振其雄风，本书作者自乏研究，也不敢希冀读者能从此书有所引发，但如能稍悟其一二，则已远出本书作者的厚望了。

末了，还得交代一下是作成书之渊源和经过。

1978年，酝酿制订全国史学规划的时候，远在北京的黎澍，写信给我，要我组织一个班子，写一部多卷本《上海史》。其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尚未恢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及历史学会方在着手重建，我把他的信交给了当时负责重建社联和历史学会的负责人。经过该会多次组织各科学者讨论，以为可行。1979年初，在成都举行全国史学规划会议，这个项目便纳入规划，而其任务则正式地落实到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头上，责成我主其事。但我始终不敢认定为多卷本，只答应组织写一部《上海史》，甚至起初只称为《上海简史》。这样，在上海历史研究所内，设立了一个上海史研究室，调集人员，勉力从事。调集到上海史研究室的人员并不多，他们对于上海史更是或全无研究，或研究甚少。于是，边学边做，经过数年的努力，写成了若干论文及与上海史有涉的专著，（其多数论文已见于《上海史研究》论文集一、二两集）这些只能算中间成果。然后集中全力，写作《上海史》，数易其稿，方成是书。荒疏遗

漏,论列有失,皆所难免。首司其责者,应该是我。可以说,我之主编《上海史》,近于阴错阳差,至今对于上海史尚乏深入研究。所可喜者,参与编写是书的诸同志,经多年研究,已成专门。上海史的研究队伍,日益扩大,上海几家大学,都有专门人才;更因近年修志,又复人才辈出,是书诸作者能够加入这一行列,更值一贺。我个人觉得极感悲伤和遗憾的是,本书的倡议者黎澍已不及见此书而匆匆去矣。

1989年3月9日

（以下文字因模糊无法准确识别，推测为编者或作者的其他说明或跋语）

前 言

上海,中国的骄傲。

有人说它是太平洋西岸的一颗明珠,有人说它是联结东西两个世界的桥梁,有人说它是通向中国的大门,有人说它是“近俄中国的钥匙”,更多的人则说它是中国的这个中心,那个基地。凡此种种,一个意愿:上海,在国际、国内地位非常重要。

然而,上海的形象清晰却又模糊。人们说各种各样的誉词,上海当之而无愧,但是人们似乎并不了解上海的全貌,迄今还没有一幅完整的上海的画像,没有一部按照上海历史本来面目勾划而成的著作,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完整的上海史。我们不揣谫陋,编写了这部书,——确切地说,一幅关于上海史的素描。如果人们在看了它以后,对历史上的上海能有一个较为明晰的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厚望了。

这,就是几个上海市民献给自己伟大城市的一份薄礼。

中国本有编写地方史的传统。汉代成书的地方史,所遗目录甚多,原书虽大多散佚,然稽核后人征引,尚可窥其一斑。其中《三辅黄图》、《三秦记》,虽所述简略,已成肇始之作。后汉卢植的《冀州风土记》,朱场的《九江寿春记》,杨洛的《哀牢传》,均属屡为后人征引的地方史。魏晋以后,地方史的著述,遍及中国南北各地,江苏的《吴地记》,浙江的《会稽记》,安徽的《淮南记》,山东的《齐记》,

山西的《三晋记》，陕西的《关中记》等等，还有专门记载地方人物的著述，如苏林的《陈留耆旧传》，陈寿的《益都耆旧传》，虞预的《会稽典录》等。刘知几说后面这些书都是“郡书”，用今天的话，就是地方史了。到了隋唐，地方史的编撰更见兴盛，书目俱见《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唐宋以降，地方史志明确分离，各为专著。图籍地志，受到朝廷的重视，成为地方官必修之书，日益兴盛。相形之下，地方史不太景气，但仍著述不断。苏州有吴昌绶的《吴郡通典》，扬州有姚文田的《广陵事略》，四川有张澍的《蜀典》，云南有冯甦的《滇考》等等。地方志以记述现状为主，其职责在于记录自然、社会各方面资料，以供研究参考。地方史以论述过去为主，研究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探寻其规律。史志并行不悖，互为补充。

近些年来，无论在国际史学界，还是在国内史学界，地方史研究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国际史学界，由于历史研究日益趋于综合化、计量化、区域化，人们对史料的完整性、具体性、精确性以至论证的科学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地方史较之国别史，比较能够满足这种要求。所以，在国际史学界，影响最大的著作往往不是国别通史，而是区域史、地方史。在国内，由于实行改革政策以及各地自主权的扩大，各地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的刺激，由于全国性编修新方志的推动，也由于国际史学趋势的影响，一个地方史研究热正在兴起。

在这股地方史研究热中，城市史尤其是大城市史格外受到人们的注意。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不但已经出版或正在编写各自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史，而且把目光投向整个世界，正在编写卷帙浩繁的世界城市史研究丛书，其中自然也有上海。就我们所知，美、英、法、日、西德等国，都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上海史，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论文和著作。在国内，特别在上海史学界，对上海史研究日益重视，研究队伍在扩大，刊载上海史论文和资料的杂志在增多，研究领域在拓展，研究水平在提高，有关专史和有份量的论

文陆续问世。上海史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

外国人研究上海史，由来已久。本世纪开头20—30年间，出版过一批上海史研究著作，比较有价值的有兰宁、库龄合著的《上海史》，梅朋、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卜舫济的《上海简史》，霍塞的《出卖的上海滩》。这些书，就史料而言，颇有可采之处，就立论而言，虽不无可取，但总的说来，偏颇多于平实。最大通病在于把近代上海的发展完全归功于殖民者，名曰上海史，实际只是租界史，而租界史又主要是西方殖民者的历史。日本人在侵华战争前后也写过一批上海史著作，那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

国内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也非始于今日。撇开记载风物、沿革的《上海闲话》、《上海小志》不算，本世纪20年代以后就陆续出版过不下十部研究上海史的著作，如王揖唐的《上海租界问题》，徐公肃、丘瑾璋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蒯世勋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等。这些著作，比较客观地叙述了租界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上海的侵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30年代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馆，集中了一批学者，对上海史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从古代到近代，搜集了丰富的资料，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出版了《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海研究资料》等有价值的成果。遗憾的是，这项事业因抗战而半途夭折。除了上述成果迄今仍为治上海史学者所沿用，就是留下了几十万字的未竟之稿贮藏于室。从总体上说，解放前国内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大多出于揭露殖民主义罪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直接配合收回租界的爱国斗争，因此，从政治上着眼较多，从道义、法律等角度评价租界较多，而对于上海是如何由一个普通的海滨县城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近代大城市，对上海在国际、国内的地位，对上海在向近代城市迈进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演变及其规律，这样一些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更不用说写一部综合的上海史了。

无论从上海在国际、国内的地位，从上海史研究的现实和历史

状况,还是从史学研究的趋势来说,都需要一部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完整的上海史。作为上海的一个地方性的历史研究所,我们自应义不容辞地从事于此。我们所从1956年建立起,就把上海史列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进行了鸦片战争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五四时期的上海、五卅运动等专题研究,其重点在于搜集整理出版了一些资料书。但是,由于无庸赘述的原因,科研人员一会儿奉命去搞“三史”,一会儿被拉去搞“四清”,十年浩劫中连历史所都取消了,系统研究上海史的愿望自然无从实现。1978年历史所恢复以后,这项工作得以继续进行。1983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正式把编写《上海史》作为市重点项目交给我们。数年勉力以赴,今日得成此稿。

二

我们认为,所谓上海史,就是上海城市产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城市形成以前这一地区的演变史。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影响。但上海毕竟有其自身的内容和独特的发展变化轨迹;上海史的编写,包括阶段的划分,重点的确定,只能从上海自身的内容出发,而不应只是在中国通史的框架里填进上海的内容。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对本书作了如下设计:全书上起上海陆地的形成;人文历史则起於吴越之交,下迄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时代而论,分为古代与近代两个部份,而以1842年6月中英吴淞之战为分界之标。全书以近代为主。古代上海虽说到清代已发展成为全县有50多万人的东南重镇,明清时期松江府经济发展诚然应受到重视,但上海作为典型的近代型城市,它的崛起主要是在开埠以后。因此,本书以约9/10的篇幅论述近代,尤侧重于开埠至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近代部份具体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1842年6月中英吴淞之战至1911年11月上海辛亥起义成功;(二)

1911年11月至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成立；(三)1927年7月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里，我们没有套用史学界通用的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划分近代前后两阶段的标准，因为从上海的实际来看，无论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还是从政权的更迭，都是分为三个阶段更为合适。

城市是综合的实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口等各个方面；城市史应是诸方面综合发展的历史。一部上海史，即使是近代上海史，也不应只是展现殖民主义侵略与上海人民反侵略、封建主义压迫与上海人民反压迫的斗争史。本着这一想法，我们在处理小刀会起义、太平军进军上海、上海辛亥起义等问题时，没有停留在对这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称颂上，而是用更多的笔墨，叙述这些斗争与上海发展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把目光向更为广阔的方面扫描，诸如城市发展中的市政问题、人口问题、社会结构，上海在由古典县城迈向近代都市过程中人们的各种观念及社会习俗、风气的变化等等。

近代上海城市，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在三家二方的特殊格局中演变、发展的。三家，即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这三家互不统属，又互相影响。三家当中，两个租界尽管彼此也有矛盾、互相拆台的纠纷，但在对待中国方面，往往又是一致的。至于政权结构、市政管理、社会组织、文化、风俗等方面，两租界则有着更多的一致性，因此，从政治、文化等角度来看，三家又可分为二方。租界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原有的基础，同样，闸北等地方的发展，也离不开租界的影响。研究近代上海城市史，不但要叙述三家各自的发展，而且要分析相互的联系与影响。这就是说，要掘上海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这些便是对我们这本书的总体构思。归纳起来，不外三条：一是地方性，篇章设置，阶段划分，重点确立，均依上海的实际而定。二是综合性，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三是

整体性，将三家二方作为整体研究对象。这三条，也是我们在研究中贯穿始终的原则。现在掩卷反思，我们感到，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艰苦努力，这三条设想基本实现了。所谓基本实现，也就是没有完全实现，特别是综合性方面。例如本着综合性原则，我们原来设想，对在开埠以后，上海市民社会心理的变化作一比较清晰的勾勒，诸如人们的世界观念、义利观念、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等等。现在尽管在有关章节里有所述及，仍嫌不足。再如，我们原来设想，对近代上海的同乡会、同业公所、帮会等社会组织与上海社会特点，对五方杂处的人口特点与上海社会活力的关系，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与海派文化的关系，对上海大城市的形成及其对周围地区的影响等方面，都应作较深入的研究。现在看来，对于这些内容，研究不够充分，表达不够完整，有些很好的见解因散见在几个章节中而被淹没，显得零散、不集中。未能完全如愿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有关资料少而散，难以形成科学性的系统看法。资料对于研究人员，目前已成致命之伤。应该说，上海的资料是丰富的，但散见各处，又多设置人为的障碍，索看资料之难，有如唐僧取经。此事不改，为患正多，爰附及之。其次，集体项目，人手多，求浑然一体之统一难，另一方面，也是主要原因，我们对史料掌握不充分，理论准备也不够。这些想实现而没有完全实现的想法，正是我们以后在研究中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三

实事求是，是我们编写本书努力遵循的指导思想。具体地说，就是力求在详实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上海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及种种历史现象。对于以往研究中，无定论或未涉及的自然要研究；有定论的也不盲从，而是经过严肃的研究，冷静的思索，提出自己的看法。本着这一思想，我们对于诸如

八·一三抗战中国国民党军队的作用，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等问题，都力求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本着这一思想，我们对租界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租界问题在全书中除了古代部分，几乎都要涉及。虽然在有关章节里分别地阐述了我们的一些看法，但这个问题具有全局性，也是至今学术界分歧较大、莫衷一是的问题，我们感到有必要在这里稍费笔墨，集中地阐明一下我们的意见。

说到上海租界，人们习惯上总把它与下列判断联系在一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冒险家的乐园，罪恶的渊藪，等等，这些是就政治、经济和社会而言。至于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或说是买办文化，或称为殖民地文化，或拟人化地称为洋场恶少，惨绿少年。这些判断本身并没有错，各自从某一侧面或某一角度道出了上海租界的状况、作用或影响。但是，如果把这些判断作为对上海租界作用或影响的总体评价，就不够全面，显非妥当。

我们认为，历时近一个世纪的上海租界，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消极与积极且往往混合在一起。

从政治上说，租界的辟建，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因为即使按照不平等的第一个《上海地皮章程》（1845年），所谓租界，也仅仅是由中国地方政府划定一块地皮，租赁给外国人居住，其地的领土主权、行政权、司法权仍属中国所有，租界不过是外国人的居留地而已。但是在其后的岁月里，外国殖民主义者屡次违约，利用清政府的软弱与无知，豪夺巧取，把这里经营成中国政府权力所难及的地方，其面积亦不断增长。这些违背条约、侵我主权的行径，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租界，于法无据，于理难容。但是，这一格局的形成，使上海租界成为中国封建政府、军阀政府统治下的一个权力薄弱点，成为封建政府、军阀政府与不满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进步人们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反动势力

可以利用这一地方，一定程度地镇压人民或逃避人民的制裁。小刀会起义、上海辛亥起义时，上海道台吴健彰、刘燕翼都是逃入租界而得以活命的。进步的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地方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躲避他们的迫害。戊戌政变以后，维新志士康有为、黄遵宪利用租界，避免了杀头之祸。1900年12月，因参加自立军起义而遭通缉的龚超，逃入上海租界，被清政府派人诱捕，又被租界工部局交涉索回，判以无罪释放。1903年的苏报案中，租界初则拒绝，捕人后拒绝清政府处死章太炎、邹容要求的事，已为人们所熟知。更有典型意义的是：1911年11月，上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举行反清起义时，不但在租界内策划起兵事宜，而且在起义以前，公开宣布起义日期与攻打江南制造局的具体时间，吓得清政府官员纷纷逃遁。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起义军敢死队队长张承樞中弹受伤后，竟返回公共租界南京路自新医院就医，由医生施行手术取出腿内子弹，并在医院疗养多日。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难以想象的。租界当局非有所厚爱于进步力量，资产阶级政府的法律观、道德观有所不同于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在相对程度上说，进步于封建主义，这是租界不同于华界的症结所在，因此，进步力量才能有限度地利用租界。封建、军阀政府，租界，人民进步力量（包括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这三种政治力量构成了奇特的三角关系。租界当局有时偏向这一方，有时也会偏向那一方。何时何事偏向何方，租界当局完全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是受其母国的习惯、传统、价值观念支配的。租界当局的这种利益的不变性和策略的可变性，使得租界与中国封建、军阀政府的关系中，存在一定缝隙，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进步人士的活动。1907年蔡元培有一段话说得最为明白：

……盖自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革命军》、《驳康

《有为政见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①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进步人们自觉利用租界进行活动的心态写照。当然，他们不免太天真、太乐观了一些。苏报案出，才使革命派猛然大惊：原来租界也和清政府一样要抓人！但是，其时国内革命的中心在上海而非别地，亦有所以然。

从经济上说，外国资本主义者在上海租界及其周围地区倾销商品，开设银行，投资设厂，大肆进行经济掠夺。据统计，到抗日战争前，除东三省外，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有81.2%集中在上海，银行业投资的79.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的76.8%均集中在上海。就全国而言，1930年，1931年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分别有42.8%、46%集中在上海。上海租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掠夺的大本营。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外国在上海租界的经营，提供了近代工业、商业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诸如技术、设备、资金、电力、交通、通讯、保险等，使上海形成了比较好的投资环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利用了这一环境，使自己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据统计，1933年，上海工业资本总额占全国40%，工人占43%，总产值占50%。1948年，上海工厂数占全国54.95%，工人占53.84%。上海不但是全国最大的民族工业中心，而且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解放前夕，上海已同世界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三百多个港口有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很长时间里，上海直接对外贸易总值占全国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1894年、1933年和1936年，上海分别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3.44%、53.77%和55.56%。上海也是国内埠际贸易中心。1936年上海对全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九万亿元，占全国的75.2%；1940年，上海的比重更上升到88%。上海还是全国的金融中心。1936年上海有华资银行58家，占全国总数35%。

^① 《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版，第一卷，第400页。

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一向是采取排挤、压制态度的，那么，民族资本为什么还能在上海这一弹丸之地取得较之中国其他地方更为迅速的发展呢？除了其襟江通海、地处富庶的长江三角洲等优越的条件外，一个显然的因素，就是租界。有个外国人在30年代对这个问题作过仔细的分析，他说：很多人不理解上海何以会这样迅速地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因为从环境来看，上海并不是理想的地方，地价贵，水源不洁，房租高，工资又比其他地方高昂。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处于动乱不安的状态，工厂发展遭到骚扰，而上海则不然，“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许多本应迁出或开设在原料产地的工厂也都在沪设厂。虽然运费成本有所增加，但在上海特别是在租界内，可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干扰。”^① 对于一个工厂来说，安定的环境有时比地价、运费等条件更为重要。

从市政上说，外国殖民主义者在上海辟地，建房，修桥，筑路，设置警察，维持治安，这一切都是为了便利他们自己的生活，便利他们对中国的掠夺。但是，这些经营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近代化城市的典范。宽阔的道路，高耸的楼房，明净的橱窗，炽亮的街灯，严格而又科学的市政管理，这些都与古典的上海县城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人专门将租界与县城市容作过对比：“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② 租界市政设施的先进性、市政管理的科学性，刺激着上海的爱国士绅，南市马路工程局的建立，以及其后的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的设立，都是模仿租界逐渐使县城市政近代化的措施。总工程师局下设户政、警政、工政等科，这种组织形式便是

^① 劳福德(L. H. Layford)：《海关十年报告之五》，《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277—278页。

^② 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4—5页。